



陈维昭著

古典名著中的酒色财气



古典名著中的酒色财气

陈维昭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05号

古典名著中的酒色财气

陈维昭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375印张 1插页110,000字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760册

ISBN 7-5360-1119-9/I·997

定价: 2.35元

引 言

一

欣赏文学作品可以有种种角度、方法、宗旨。中国古典小说、戏曲是从民间说唱艺术发展而来的。到了宋元时期，城市经济开始发达，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露天游艺场“瓦舍”。在瓦舍里演出的伎艺多种多样，有说书、戏剧、杂技、舞蹈等等，讲唱艺术就是其中之一类。它所讲的内容大多是历史故事，观众多是为了了解王朝的兴衰，人物的遭遇，这种欣赏角度主要是故事情节和人的命运。后来的读者也以这种角度去欣赏历史演义小说。到了明、清时期，小说、戏曲艺术开始成熟，聪明的读者已经意识到文学作品是作家虚构出来的，开始注意作家的创作意图，即他创作这部小说或戏曲，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这种猜测有时甚至达到神经过敏的程度。有人说高则诚《琵琶记》的创作是为了影射生活中王四这个人，因为“琵琶”二字中有四个“王”字。又说《金瓶梅》是明代大文豪王世贞创作的，写得如此淫秽，是想以此为诱饵，去害死奸相严嵩之子严世蕃。到了清末、近代，人们的欣赏角度又转移到文学故事与作家的关系上，喜欢在这一点上“索隐”、“考证”。有人说，《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是有生活原型的，其生活原型就是某某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的

阶级斗争意识和反封建意识强烈，其欣赏的角度也就与此相关。人们为文学作品中的 人物评定阶级成分，划分阶级阵营，说梁山泊英雄是农民阶级，宋江是叛徒；又说薛宝钗是封建卫道者，贾宝玉、林黛玉是封建叛逆者。同时，人们用西方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等概念来界定某些古典文学作品，说《红楼梦》、《儒林外史》是现实主义小说，或批判现实主义小说，《金瓶梅》、《野叟曝言》有自然主义倾向，《西游记》、《聊斋志异》是浪漫主义。到了80年代，人们觉得封建主义就是扭曲人性、压抑人性，要反封建，就必须肯定人性，于是人们的欣赏角度就转向文学人物的价值取向，说贾宝玉不读书做官，就是追求个人自由、个性独立；他与地位低下的丫鬟厮混，表明他具有“民主倾向”；他跟父亲闹别扭，是反封建；他喜欢少女，而且不只一个，反映了人对欲望的追求。后来，“文化热”兴起，人们不满于以往的欣赏角度，社会上观念的变化，也使欣赏的角度改变。有人就说《红楼梦》表现的是宇宙的自然演化过程，小说写女娲氏看到天残缺不全，就在大荒山无稽崖上炼顽石去补天，最后剩下一块未用，就丢弃在青埂峰下。后来被一个道士和一个和尚携带到红尘里，投生在繁华富贵的贾府中。同时，太虚幻境的警幻仙姑也把一批情痴、情种送入红尘。这样，出现了贾府、大观园、四大家族，出现了一个熙熙攘攘的世界，“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这正应了《老子》上的那句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无到有，“道”孕育出万物。宇宙、自然、人类，生生不息。然而，众相趋寂，万境归空，煌煌赫赫的四大家族尽趋毁灭，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欠命的，命已还；欠

泪的，泪已尽，终不免食尽鸟投林，最后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显然，上述这些欣赏角度都体现了欣赏者所处时代的欣赏情趣。但是，由于它们的实用目的，反而把古典文学所表达的其作者时代的对于人生及生活的基本理解给忽略了，因而对于古典文学的人生意向的理解就不免显得牵强。所以与其说它们是在欣赏，不如说是古为我用，以古证今。譬如说，“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等本是西方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概念，它们本身有特定的含义，它们是针对西方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而言的。中国人的生活处境显然不同于西方人，中国人的生活态度显然也不同于西方民族，如果从“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等创作方法的角度去欣赏中国古典文学，就不免方圆凿枘，难圆其说。例如，《红楼梦》是一部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不像《三国演义》那样以夸张的传奇手法烘托英雄豪杰的超凡威武，也不像《西游记》、《聊斋志异》那样以怪诞的寓言手法渲染灵异鬼怪的神秘玄虚，而是按迹循踪，实实道来。有人因其写实性而把它称为“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然而，《红楼梦》除了如实地叙述现实生活之外，还写了大荒山的一僧一道、太虚幻境，写了巫祝、符咒的应验，等等，这些神秘的情节穿插在写实性的叙述中，所以，把《红楼梦》称为“现实主义”小说，自然只好把这些离奇的情节忽略不计。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这痛苦来源于人的欲望。有了欲望便产生了满足欲望的意志，并付诸行动。在满足欲望的过程中充满了种种痛苦；欲望满足了，人又萌生新的欲望，开始了新的痛苦，新的厌烦……如此

循环，以至无穷。所以人生痛苦的解脱就在于拒绝一切生活之欲，在于出世。王国维也认为，《红楼梦》的价值就在于它既揭示了生活的痛苦的本质，又指出痛苦的解脱在于出世。他把《红楼梦》当成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哲学的中国翻版（《红楼梦评论》）。然而，只要我们注意一下贾宝玉（也是作家）的家族观念，他对于家族颓败的无可奈何的心态，我们就会清楚，作家实在是不甘愿“解脱”的，他对于生活，实在有着太多的眷恋。

当80年代“文化热”兴起的时候，人们觉得应该把文学也看成一种文化现象，然而，这种“文化透视”、“文化阐释”却往往局限在文学作品与儒、道（道家与道教）、佛等哲学、宗教观念的对应关系上，仿佛中国文化就等于儒、道、佛。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哲学、宗教只不过是观念形态，它们的真正根基是生活。它们首先是对人的基本生活态度的升华，是一个民族的深层心理的理论概括。抛开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基本态度，忽略中国民族的深层心理，而去奢谈儒、道、佛，只能是削足适履。有人认为，《三国演义》要表现的是“浪花淘尽英雄”的宿命论，但是，小说对于人生所持的潜在的基本态度却是儒家的，刘备集团为坚持正义而不惜赴汤蹈火的精神正是表现了儒家的品德。吴承恩的调侃人生的态度使《西游记》成为一部道——佛小说，然而主人公孙悟空身上却明显地存在着儒家那种对于主人的效忠观念以及对于正义事业的忠诚信念（见王京玉《中国传统小说中的循环人生观及其意义》）。那么，《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究竟是儒家的，还是道家的，或者是佛教的？抑或是“儒、道互补”、“三教合一”？如果这样的话，每一部中国古典小说或戏剧都可作如

是观，那么，这样的“文化阐释”又有什么意义呢？相对于文学作品所表达的人生态度来说，这种欣赏角度便有舍本逐末、隔靴搔痒的弊病。

一个民族对于人的基本需要的理解及其基本需要的满足状况，决定其文化的主要内涵和价值取向，决定其民族思维的起点、对象、模式，决定其哲学、宗教、文学的论题及其表达方式。中华民族对于人、生活，对于人的基本需要要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与态度，只有了解这种独特的理解和态度，才能基本了解中国的哲学、宗教、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底蕴。而中国古典文学正是我们理解昔日中国民众的生活态度与深层心理的有效中介。反过来说，这种中介作用，是我们欣赏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最佳角度。

二

《红楼梦》第一回在讲了一个关于石头的神秘故事之后，又介绍了甄士隐的既真实又离奇的故事。乡宦甄士隐禀性恬淡，对于名誉、地位没有什么兴趣，每日只是以观花种竹、酌酒吟诗为乐，简直是神仙一流的人物。知足常乐，他的一生本来应该是诗意一般的。无奈美中不足，他年过半百，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可以聊慰孤寂。不料，祸从天降，女儿于元宵之夜失踪，从此，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妻子得了重病，火灾把他家烧成了一片瓦砾场。他狼狈不堪，寄人篱下，饱尝世态的炎凉，终于贫病交加，渐渐地显得衰老起来。有一天，他看到远远来了一个跛足道人，口中念念有词，说的是：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当时，甄士隐听得含糊，只有“好”、“了”二字却还真切。跛足道人笑道：“你若果听见‘好’、‘了’二字，还算你明白。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我这歌儿便叫《好了歌》。”甄士隐听了，即时顿悟，他给这首歌作了注解。注完，跟着跛足道人飘然而去。

甄士隐从此隐去了。然而，这首歌所表达的心态意绪就如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红楼梦》的全部情节。它指出，功名、财富、姣妻、儿孙等都是人所追求的，然而，这些又都是虚幻的。对于这种心态意绪，我们并不陌生，它与宋元以来的“警世”、“劝世”的叙事传统如出一辙。这个叙事传统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戒绝“酒、色、财、气”。

自宋元以来，中国的戏曲、小说里有一个“警世”、“劝世”的传统主题。在这一类作品里，总有那么一个（或一群）人不满足于现有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他追求金钱（财），追求女人或沉溺于夫妻情欲（色），追求温饱之后的享受和放纵（酒）。在追求的过程中，他相信这些人生目标具有最高的价值，他以为这就是幸福人生的最高境界。他以顽强的意

志(气)和强烈的情感去追求、实现他的人生目标，他不到黄河心不死。后来，不管他是半途而废，还是达到了目的，他已陷入了不幸与罪孽的深渊，他造成了他人的灾难，更给自己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他的生活处境似乎就要“好”起来，但是，他的良知，他的前途，他的亲人，甚至他自己的生命，却从此“了”结了。如果他在这场毁灭性的打击中能够幸存下来，他会在满目悲凉之余翻然悔悟，会感到人生的追求的空幻、荒谬。正如《红楼梦》里智通寺门上的那副对联所说的：“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作家在对人的基本需要作一番形象生动的渲染之后，终于又宣告这些需要的虚妄。

“警世”叙事传统把人的基本需求笼而统之地概括为四个字：酒、色、财、气。据说，元代以前的文学作品及文章里只有“酒、色、财”三戒。从元代开始，连“气”也戒上了。“今人率以酒、色、财、气为四戒，莫知其始。按《后汉书》杨秉尝从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财、色也。’王祹《华川卮辞》云：‘财者陷身之阱，色者戕身之斧，酒者毒肠之药，人能于斯三者致戒焉，灾祸其或寡矣。’是古原止有三戒，不知何时添一‘气’字，殆始于明人。”（梁章钜《浪迹丛谈·续谈·三谈》）今人郑培凯认为，中国历来有“酒、色、财”三戒，到了元代才开始把“气”给戒掉。

在中国文化中，“酒、色、财、气”这四个字具有特殊的含义，它们基本上代表了中国文化对于人的基本需要的理解。

关于人的基本需要，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人的动机理论》中认为，健康的人具有五种基本的需要，即

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生理需要是指寻求食物以保证生存的需要。一个人在生活所需的一切东西都没有的情况下，他的主要动机很可能就是生理的需要，他对食物的渴望很可能比别的东西更强烈。他的意识几乎完全被“饥饿”所优先支配，追求食物成为唯一的目标。这种为饥饿所困扰的处境也影响了他对未来的看法，他的理想境界可能就是食物十分丰富。在他看来，只要在他的有生之年食物有保证，他便是最幸福的。生活本身被看成是吃饭，其他任何东西都是次要的。自由、爱情、团体的感情、尊重、哲学观念全都可以置之一旁，因为它们不能填饱肚子。

当生理需要满足之后，就会产生安全需要。喜欢常规的生活节奏，希望有一个可以预测的有秩序的世界。一般人都偏爱有保障的工作，喜欢选择干自己熟悉的事情。安全需要可以看成紧急状态下的积极的支配的动员力量，紧急状态可以指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罪犯的袭击、社会动乱、长期处于逆境等。

假如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都很好地满足了，就会产生爱、情感和归属的需要，他感到缺乏朋友、妻子或孩子，他渴望在团体中与同事之间有着深情的关系。

爱的需要满足了，人又希望自己有稳定、牢固的地位，希望别人的高度评价，这种尊重的需要包括自尊、自重，或为他人所尊重。他希望有实力、有成就，要求独立、自由，要求名誉或威望、赏识、重视。这些需要一旦受挫，人就会产生自卑感、软弱感、无能感。

这些需要满足之后，人还有最高一层的需要，即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是指促使人的潜在能力得以实现的趋势，希望

自己越来越成为所期望的人物，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

这五种基本需要排列成一个优势层次。由生理需要开始，一直到自我实现需要，渐次向高层次发展。马斯洛认为，同一种层次的需要，其具体内容是因文化而异的，也即从文化的角度看，人的需要具有文化的特殊性；但从需要的角度看，各种文化却具有一致性。（以上马斯洛的理论参阅林方主编的《人的潜能和价值》一书）

中国古典名著里的“酒、色、财、气”不一定与马斯洛的基本需要结构相一致，也不是呈现由低级到高级的循序渐近的需要序列。但从内容上看，它可以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认为的健康人格的四大基本需要。纵酒（借酒消愁者除外），是一种享乐的需要，是超越了饥饿阶段之后的带有愉悦性质的享受。马斯洛没有把享乐需要列为人的基本需要，因为没有酒，人照样可以生存、发展。但是，“酒”这个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尤其当它与“色、财、气”排列在一起时更是如此。它代表一种闲适的自由的生活境界。这种境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几乎被看成是一种普遍的理想境界，不管是皇帝朝臣、达官贵人、富裕阶层，还是平民百姓，都以“偷闲学少年”作为摆脱繁冗、忙碌工作的需要。人们忙于寻求生计，为此而必须耗去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摆脱饥饿状态和下贱地位的同时，便潜伏着过闲适自由的享乐生活的需要，林语堂甚至把中国人的生活观念称为“愉快哲学”。他认为晋代陶渊明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是中国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陶渊明没有做过大官，也没有什么勋绩，除了一本薄薄的诗集和三、四篇零星的散文之

外，在文学遗产上也不曾留下什么了不得的著作。他的生活方式和风格是简朴的，他的心中虽有反抗尘世的欲望，但并没有彻底逃避人世，而反使他和七情生活洽调起来。他的嗜好就是喝酒，他的闲适、自由的享乐生活在饮酒中得到了淋漓尽致表现。（见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色”，指女色。包括情欲、爱情、色情、婚姻。好色，也即人的情感归属需要、感官享受需要，以及传宗接代的需要。作为中国文化的最极端形式的宋明理学，其“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禁欲主义。其实，从《周易》开始，中国思想便大力提倡男女之伦，指出男女的媾合，是出于繁衍种族的需要。后来，随着人性的逐步觉醒，人们渐渐地承认，人的“好色”的需要还包含着感官享受的需要和情感归属需要。

“财”的需要即指物质的需要，它不仅指马斯洛所谓的生理需要，生存需要，而且指对富裕生活的追求，是过豪华挥霍生活的需要，享乐的需要，甚至包括对意外之财、非分之财的需要。

“气”，则近似于马斯洛的“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它涉及到人的物质与精神的追求，人的情感需要、功利欲望、人格的独立、心灵的自由等需要，以及对道德、真理、正义的追求、执著等等。

可以说，中国古典文学以“酒、色、财、气”四字概括了一般人所具备的基本需要，并通过艺术形象，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文化价值取向。揭示出蕴含在这些基本需要背后的民族文化情结，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典文学。

以上只是我的一家之言，提供各位参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酒色财气”为切入角度，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作了认真的探讨。研究了“酒色财气”对社会、对心理影响的双重性：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

全书共分四章：《酒：文明生活的刺激剂》、《色：人类性爱的种种形态》、《财：对于生命的双重意义》、《气：精神生活的内在动力》，每章均列举大量生动具体的事例，从而论述在古典文学名著中酒色财气所表达的人生意向及传统文化观念。

本书见解独特、论据丰富、分析精当，值得一读。

引 言

第一章 酒：文明生活的刺激剂	1
一、“若好酒，未有非名士者也”	1
——阳刚之气的激发	
二、“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	6
——享乐主义的佐料	
三、“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12
——腐朽理性的反叛	
四、“三杯五斗入醉乡，性乱神昏没主张”	15
——唤回失落的理性	
五、“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20
——酒：苦闷的象征	
六、“酒损精神破丧家”	25
——戒酒的养生学意义	
第二章 色：人类性爱的种种形态	29
一、“将仲子兮，无徯我墙”	29
——性爱与人性	
二、“人种来了”	36
——性爱与种族繁衍	

三、貂蝉的功用.....	40
——“女人亡国论”与“女人救国论”	
四、“惊丑”与“诧美”.....	46
——外貌的相悦	
五、皮肤滥淫.....	51
——性欲的放纵	
六、“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56
——纯洁的情欲	
七、贾宝玉的“意淫”.....	61
——超越性爱之上的博爱	
八、鼓盆成大道.....	66
——自由与自私同行	
九、“可怜风月债难酬”.....	70
——爱的困惑	
十、“暗里教君骨髓枯”.....	76
——性的恐惧	
十一、“情缘总归虚幻”.....	82
——爱的形而上学	
 第三章 财：对于生命的双重意义	 88
一、“无钱对菊，彭泽令亦当败兴”.....	88
——生存的基本需要	
二、“荣时筹画衰时业”.....	93
——家族观念的物质基础	
三、“有钱能使鬼推磨”.....	96
——财富的消极意义	

四、“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101
——追求财富与道德的矛盾	
五、“财如血，些儿出来疼如裂”	108
——恋钱癖的劣根	
六、“一饮一啄，莫非前定”	113
——对于财富的宿命观念	
 第四章 气：精神生活的内在动力	 117
一、“专气致柔能婴儿”	117
——养生之气	
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121
——崇高人格的心理动力	
三、“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	125
——忍耐的民族性格	
四、“清明灵秀之气，漫无所归”	132
——价值追求的苦闷彷徨	
五、“蓄极积久，势不能遏”	137
——情感的自由宣泄	
六、“秉正邪两气而来”	143
——怪诞人格的形成	
七、“展放愁眉，休争闲气”	150
——意志的泯灭	